

倾听来自人类学家的声音

——西亚非洲所学者与辛格尔顿教授对话录

本刊特约记者 刘海方

编者按:米歇尔·辛格尔顿(Michael Singleton),比利时鲁汶大学人口和发展科学中心教授,曾常年在坦桑尼亚、乍得、塞内加尔、刚果和毛里塔尼亚等国居住,从事人类学研究。2000年6月4日,辛格尔顿教授来到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中国学者就非洲人类学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座谈。记者根据这场别开生面的对话整理出本文,以飨读者。

中方学者(以下简称中):非洲人类学研究的特殊之处何在?人类学对当代非洲和非洲学研究本身的意义是什么?

辛格尔顿(以下简称辛):1980年代人类学之所以日益成为显学,是因为人们对个人自传式的细节愈加注意了;同时,人们更重视“在哪里、目的为何、去向何方”的问题。人类学就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种方法、一种研究手段,其特点是深入实地、具体而特殊。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三个要素是:1.进入当地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2.用整体的观念进行思考,同时与同类事物进行比较研究;3.发掘现象背后的深意。简言之,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的逻辑。

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特殊性。如果一味追求同一模式,我们周边的文化就会成了博物馆,成了某种僵化的纪念品。我们需要另外一种选择,即边缘的“另类性”。如何确认此种“另类性”呢?一是关注特殊的、不同的声音,因为它们可能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另外一种选择。这是哲学家们应该做的,他们甚至可能先于社会现象想象出这种特殊性来。其二,就是人类学家所做的,深入不同性质的文化中进行实证研究,倾听、理解这不同的声音。

我认为应该关注的是非洲的单一性,看这种特殊性与全球共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必须提倡另类的文化、坚持文化的多元性,否则就会

终结于一种文化里,那也就意味着历史特殊性消失了。

非洲学研究不是纯粹出于诧异感和增加工作机会或出版物的需要,也不仅仅是帮助非洲解决实际问题,它事关我们能否为全人类文明提供更多一些可能性、一些人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非洲人治疗疾病的方式就非中非西,别具一格,我们维护了这种“另类性”,就体现了非洲学的重要意义。

杨立华(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您认为非政府组织(NGO)应该在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具体在非洲的情况又怎样呢?

辛:NGO首先应注意不要成为政府的工具,因为NGO是平衡市民社会与政府的制衡机构。英国有许多照顾老弱病残的NGO,我认为它们的宗旨错了,因为政府已经收取了每个公民的税,就应该履行照顾每个公民的义务。NGO更应是一双监督的眼睛、一个呼吁的声音,来提醒、敦促政府完成其职责;而且NGO只有保持自己边缘社会的明确位置,才能更好地实现这种社会功能。

至于非洲的NGO,明显与西方的大相径庭。西方是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NGO是公民们自行组织起来制约政府的机构。而非洲连典型西方意义上的政府都没有,遑论非政府组织呢?非洲的社会尚有部落性质,故所谓NGO,通常是民族

或部族的组织,而且经常带有宗教运动的色彩,说得不礼貌一些,多少有些分离主义的性质。

中:请您谈一谈欧洲的非洲学研究现状吧。

辛:就整体而言,欧洲的非洲学研究水平在下降。比利时可以称之为这门学问研究的中心,英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研究多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地中海国家、西班牙、冰岛的研究很少。很明显,这种参差不齐的状况与西方的侵入和殖民历史有直接关系。欧洲对非洲的关注,原来是出于军事和殖民利益,然后是自美国时代以来的商业取向,现在对非洲学的纯粹学术兴趣日趋减少。非洲学在欧洲原本更流行、更处于中心一些,但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了。非洲学在欧洲正从原来的中心位置走向边缘化,只局限于学术界内部,几乎像在欧洲位于边缘位置的东方学了。

虽然欧洲有很多研究非洲的便利条件,但纯粹的研究兴趣正在衰退。我过去在非洲进行田野考察,许多欧洲同行即使只呆在大学里面也可以作研究,因为我们有14世纪葡萄牙到达东非和西非以来的大量档案资料。但因为前景黯淡,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学者不再热情洋溢地准备投身于非洲研究了。过去,学者们可能孜孜不倦地研究,50年如一日,在最终不得不退休前,或许才有一本巨著问世。现在可不同了,你不得不每年都出版一些东西证明你还有用,你的观点是最新的。你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文章,甚至对根本不理解、不接受你的观点的编者也要尽力争取。

令人欣慰的是,欧洲还有一些人在从事非洲学研究。虽然非洲学研究的兴趣似乎正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消失,但为生计考虑(有些欧洲国家的失业率高达15%~25%),许多年轻人正转向对第三世界研究和发展工作上来,有的成了在非洲工作的医生、护士和教师。他们是“初级阶段”的研究人员——从他们的研究目的(为了生存而研究)和他们的研究兴趣及能力而言都是如此。

我们这一代人当年能找到的研究基金也少了,而田野工作又是急需要钱的。人类学家急需有关发展项目的基金资助,学者原本可以以这种发展基金工作人员的身份前往非洲,把研究与田

野考察结合起来,但资助者总是要先知道你的研究计划是否与他们的项目相符。作为人类学家,你如果只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去获取资料,确定村里实行多妻制,还是一夫一妻制,你只能把全村人召集起来,发一份问卷,或直接面对面地问他们,你们是多妻制还是一夫一妻制?他们会说,也许是多妻制,但他们可能早已超越了多妻制的阶段了。你建议他们种植这个或那个,建立什么养殖场,建立学校发展教育,但一年后你会发现你建议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实现。这就是当前研究现状带给我们研究者的悲哀。

中:那么非洲本土学者的研究状况如何呢?

辛:我以为第一代非洲学者(例如我见过的40~50年代的谢赫·安塔·迪奥布、桑戈尔)完全可以与同时代的西方学者媲美。但现在我们鲁汶大学里的非洲学者来自教育被破坏了的国家,那里的学校体系消失殆尽,教育和教学状况很差。我们在非洲招收能读、能写的学生到欧洲学习,但他们多数要花去一半的时间谋生,纯粹用于研究的时间却少而又少。谈到非洲学研究事业,我希望20~30年后,非洲人自己能够承担非洲学研究。但考虑到他们的物质状况,我并不乐观。1969年坦桑尼亚还有3个很好的图书馆,以及很好的出版社及优秀的书籍,不仅有欧洲学者的,还有许多东非一带学者的著作。但到1993年我再次回去时,都关门了。

杨立华:您讲到了非洲学术界和教育界令人沮丧的现状,但毕竟非洲出现了些新动向,如去欧洲接受教育。在新一代非洲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回去吗?是否也有严重的人才外流问题?

辛: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个令人悲哀的问题。据我所知,许多回到非洲的人境况都不怎么好,喀麦隆的一位学者甚至惨遭杀害。塞内加尔也有这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朝不保夕,他们可能被迫离开祖国成为难民。我很能理解他们何以不留在那种困境里,因为我认为做第一个投石头的人并不聪明。在鲁汶大学里,也不乏这样的非洲人。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后,我们培训的

12 个人回去后几乎都被杀了。现在 2/3 的非洲人接受培训后都选择了留在美国或欧洲。他们可能会被吸收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但多数都是在某些具体原因使其不得不放弃回国的打算之后。他们在那教书,同时也向世界宣传非洲。所以,非洲的出国潮也并非只是一幅消极的图景。

杨光(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美国学者面对非洲学的衰落正在采取一些对策,例如把地区研究与学科发展结合起来,把非洲研究与当前世界主要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在筹集资金方面,他们主动与美国黑人取得联系,因为他们中间也有许多富裕者。可见美国的非洲学研究还是取得了进步的。您能否谈谈欧洲是如何面对非洲学衰落的?

辛:欧洲缺少美国那样的优势,也就是说,欧洲不能利用美国黑人那样的寻根愿望来取得对学术研究的支持。有趣的是,许多美国非洲人愿意回到非洲去,但 90 %的人从第一天就开始准备登上返回的航班。他们批评那里的蚊子、疾病,他们过于注重精神问题而有些幻想化和不切实际。海外非洲人不能与本土非洲人好好地相处,甚至美国大学校园内也存在这种情况。重要原因是双方的发展取向不同而导致看待问题的眼光迥异。

欧洲人更关注国别研究,而且研究更为深入、更为激进。他们在研究中应用了人类学方法,也在进一步走向文化研究的方法。我们学校的非洲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非洲学本身了,甚至扩展到了性别研究,女性问题研究系就是依靠非洲历史学和非洲学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非洲学衰落纯属个人的、职业性的担忧,我们还要想想只局限于现有的发展思路和文化视野,人类的思维方式、视野广度和深度是否都过于狭隘了?

中:您为什么提倡中国学者不要局限于用英语研究非洲学,而是要更关注法语非洲学界?

辛:法语与英语相比能提供更准确的思想内涵分析,英语可能更长于表现事实。所以,用法语思维的学者肯定与你们经常接触的习惯用英语思

维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和思考。因而我建议你们多关注法语非洲国家,也更多了解法语非洲学界。

中:那就是说中方学者应该更多去法国的大学访问吧?

辛:不,我倒建议中国学者们宁可选择鲁汶大学也不要选择法国的索邦大学。鲁汶大学有 500 年的历史了,是个天主教大学,但办学原则是兼收并蓄的。现在有 2/3 的学生来自法语非洲国家。我在人类社会学系,这个系是人类学与社会学联姻的结果,致力于更广泛的人类学研究,其中设有我发起建立的人类学实验室。鲁汶大学是有强大的非洲学研究实力的。

杨立华:发展问题关系着民主化问题。西方强调他们在民主化方向上的领导权。非洲的民主与发展实际上与西方大不相同,而且非洲内部也多种多样,丰富多彩。非洲国家 90 年代以来取得了许多发展,而且有向南部非洲倾斜的趋势,那里相对享有更多的社会安定和安宁,许多欧美学者也纷纷前来就是明证。那么,您对西方化的民主化与非洲本身发展的看法如何,它们与传统的非洲价值观有什么不同吗?

辛:您的问题非常深刻,也非常难回答。我不太肯定民主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但发展却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力量促动的东西。欧洲的发展是从史蒂文森发明蒸汽机开始的,是发展本身已成为一种无可抵御的力量后的一种过程。但欧洲的发展时期可能是最不民主的时候。讨论非洲的民主与发展以及这两者的关系时,我举埃塞俄比亚为例。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祖父孟尼利克时代曾自上而下地灌输过现代化思想,并以直接命令的方式实施现代化。我们现在认可的民主多数是自下而上的,但发展经常是从上而下进行的。

另外一个危险是:民主概念经常会与政治制度以及党派政治目标混淆起来。如果像许多政治家提倡的,民主就是分权化,那么在非洲这种强调部族主义的地方就会出现更多的部族主义政权,一个蒙博托就会变成许多个蒙博托,灾难会更多。

民主也不仅意味着个体拥有的权力有多少,

家庭之中也总有主导者,但不一定没有民主。马克思、密特朗、克林顿各有不同的民主主张。人的差异性是如此之多,每个人的说法都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定义。因此人们对民主的定义也是不同的,关键在于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

至于传统价值,非洲社会里也许不乏民主的传统因素,问题是我们不能以西方起源的民主定义衡量非洲的社会民主化程度。

杨立华:有人称现在是非洲的复兴时期了。在您看来,非洲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实施自己的发展方式的时候了?

悲观主义者认为非洲在下两三个世纪内都不会有希望;乐观主义者则认为非洲正处于大有希

望的时候。我个人持一种中间的现实主义观点,但我强调非洲应该有不同的发展,不同于美国、英国模式。

发展是历史因素的积淀,它要从众多偶然社会因素的基础上生长起来。那些继承了英国发展结果的国家并没有一样的历史要素,所以发展在各地就显现为不同的情形,所谓发展的意义有必要因地因时而加以甄别。发展的想法是很自然的,谁都希望生活更好一些。它应该意味着更多人性化。我自称是非洲现实主义者,即耐心等待,悉心观察,看看非洲到底会发生什么。

(责任编辑:吴传华;责任校对:吴传华)

学	术
动	态

西亚非洲所邀请莫桑比克大使 若泽 德莫莱斯演讲

时值中国与莫桑比克共和国建交 25 周年之际,西亚非洲研究所邀请莫桑比克驻华大使若泽 德莫莱斯到该所做演讲。

德莫莱斯大使演讲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大使首先回顾了双方建交以来的详细历史,指出中国是 1975 年莫桑比克建国后第一个予以承认的非洲以外的国家。此后,双方维持了良好的友谊,甚至在中苏大论战时期也未动摇过。而且,莫桑比克是中国与非洲其他国家之间友好关系得以维持并深化的和平使者。大使强调:“中国与莫桑比克的关系不仅是一般的伙伴关系,而且是非同寻常的朋友关系”。

第二个方面,大使谈了莫桑比克和平进程问题,并就南部非洲有关国家的政治局势发表了评论。

西亚非洲所多年从事中非友好关系跟踪研究的徐济明研究员评价德莫莱斯大使的演讲说,此次演讲不仅是对于中莫友好关系的纪念;对于学者而言,演讲内容本身填补了以往知识上的空白点和疑难点,也同时获得了对外交关系史的深入理解。

(海 方)